

桂林老房子 系列11

“关键先生”

上一篇我们提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图书馆回到王城旧址重建并开放的时间为1946年至1955年。也就是说，图书馆从“王城重建”到“搬迁榕湖”，这期间只有9年时间。要知道，这座图书馆最早始建于1909年，是广西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中国建馆最早的十座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图书馆最早建馆时的地址就是位于桂林靖江王城东南隅，排除1941年到1946年因为战争不得不转移这段时期，可以说自清朝建馆到解放，图书馆在王城就搬过窝。而历经艰辛，好不容易于原址重建的馆舍，为何只使用了短短9年就要换地方？这不禁令人好奇。其实，这与一位人物有着莫大的关系，此人正是上一篇中也提到的著名教育家唐现之。

翻阅唐现之的人生简历可知，其为桂林灌阳人，1919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教育科，科主任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唐现之成为陶行知三个得意门生之一。熟悉唐现之的朋友大多知道，他于1938年主张创办了桂林师范学校（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任该校首位校长。而鲜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也担任过广西桂林图书馆馆长。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历任领导名录中，我们意外地发现，唐现之在广西桂林图书馆任馆长的时间刚好就是1946年到1955年，也就是图书馆于王城重建到搬迁榕湖之间的这9年。这9年，图书馆究竟经历了什么，王城旧馆为何使用时间如此短暂？如今的榕湖分馆又如何而来？或许能从唐现之这位“关键先生”身上继续发掘。

热衷读书的城市

1946年春天，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桂林城一片废墟，百废待兴。当时的广西省政府要重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唐现之受命从重庆回到桂林着手此事。省政府下了“限时令”，要求图书馆要在3月15日前开放阅览。

唐现之是2月份回到桂林的，图书馆要在3月中开放阅览，省政府的这一“限时令”可以说是要求非常苛刻。战后的建设条件可想而知，既没有现成馆舍，也没有设备，只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和历经战火转移幸存的七万余册图书。一个月的时间，重建一座图书馆是不太可能的，为了尽快开放阅览，唐现之只能一面招人，一面寻找可以使用的房屋。在王城省政府驻地内，他们寻得破屋两间，稍作修整，将就着充当起临时馆舍，重新开馆。

临时馆舍开放阅览后，正式馆舍重建的工作才正式启动，而仅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重建工作也宣告完成，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堪称当时典范。

1946年9月1日，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举行了落成典礼，这栋馆舍就是上篇的王城2号4栋。此馆当时分四个阅览室（普通、新闻、儿童、特藏）、两个藏书库（普通、特藏）、三个办公室（采编部、总务部、阅览部）及馆长室。

从唐现之到任图书馆馆长，再从寻找临时馆舍开放阅览到原址重建落成，实际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如此之高效只是因为省政府的“限时令”持续高压吗？可能是，但不仅仅是。压力建设其实更多来自唐现之自己以及广大民众。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出版事业空前繁盛，被誉为抗战文化城。1938年至1944年间，作为西南抗战大后方之一的桂林，书店、书局林立，先后开设的各类大小书店、出版社达220余家，发行了各类图书数千种，各类杂志240余种，所以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而言，阅读是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对图书报刊的热衷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而历经战争之后的桂林人对图书更是充满渴望。史料记载，1946年4月至8月，仅仅是以两间破屋翻新而来的图书馆临时馆舍，每月阅览人数就达到6000人以上，也就是日均200人以上。

9月1日，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旧馆修复完工开馆，当日阅览人数达715人。

新开馆后，9月至11月，来图书馆阅读的人数倍增，每月阅览人数均在14000人左右。

在每日入馆阅读的人群里，又以学生群体占比第一位，公务员占第二位；所读图书则以文学类占第一，社会科学次之。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桂林城内青年群体对知识的渴求，更说明了当时的桂林不仅是一座文化城，亦是一座充满朝气的文化城。而对于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和馆长唐现之来说，这也是他们积极办好图书馆的原动力。

当时的图书馆采编部除了整理旧书籍外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添购新书，买不到就向省外各地征求，图书馆于王城旧馆复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增添书籍3000余册、杂志1000余册、报纸将近40种。但唐现之觉得还不够，当年年底他又亲自到京沪等地采购新书上万册，同时号召社会各界捐赠图书。

从王城到榕湖之间的那些事
再话广西桂林图书馆：

□本报记者苏展文摄

在上一期“桂林老房子”中，我们对王城内一栋鲜为人知的建筑进行了追根溯源。通过多方证实，其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原址重建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以下简称广西桂林图书馆）旧馆。同时我们了解到，这栋建筑作为图书馆使用的时间其实只有9年。至1955年，图书馆便搬迁至榕湖新馆。从王城到榕湖，两栋“老房子”之间看似平常的9年，其实背后蕴藏着很多故事。

作为陶行知的高徒，一直热衷教育事业的唐现之认为图书馆对民众认知普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图书馆任职期间，他始终力求把图书馆办成一所社会大学，加强对读者的服务。图书馆于王城复馆后，每天开放12个小时，坚持天天开放，逢假不休。至1948年，全年阅览人数为23万余人次，对于当时仅有9万人口的桂林来说，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图书馆梦”

来图书馆阅读的人日益增多，图书馆里的藏书也在不停添置。只是这样的增速在当初复



图①：广西桂林图书馆榕湖分馆正面。



图②：广西桂林图书馆王城旧馆正面。



图③：广西桂林图书馆王城旧馆（上）与榕湖分馆（下）的内部设计如出一辙。

从民国到新中国

1949年，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时局瞬息万变，图书馆的命运走向的方向盘再次交到了唐现之的手中。

其实，早在唐现之到图书馆任职之前，从他从事教育办学时起，他应聘的教师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他的长子唐振裘、次子唐振元都是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唐现之在图书馆任职期间，图书馆以及他创办的育德小学（如今的十三中），都是中共桂林地下组织的活动据点。图书馆的地下党员，曾利用图书馆这一有利条件，开展进步书刊借阅以及开展革命活动，都得到了唐现之的掩护与支持。

桂林解放前夕，唐现之参加了党领导的桂林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工作，当时白崇禧派人到图书馆传达把图书押运南宁，唐现之拒绝了这一要求，带领全馆开展护馆斗争。他还带头反对全市中小学和文化单位疏散，极力动员其熟悉的各部位设备不散、人员不走。11月22日，桂林解放，唐现之携全家老小到中山中路欢迎解放军。

解放后，唐现之继续担任图书馆馆长。此时日月已换新天，而那个“图书馆梦”，唐现之继续做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唐现之带领全体职工利用图书资料，举办展览、读书会、读者座谈会，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吸引更多读者。

上文我们提到，解放前，走进图书馆的人群多以学生和公务员为主，而解放后，图书馆将自己的服务推向更加广泛的群体。他们在馆外设立图书流通站，辅导农村开展图书活动，同时开办工人业余夜校，唐现之任校长，其他同志兼任教师，使更多失学的劳动群众获得了知识，从而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4年，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入驻王城办学，图书馆王城馆舍拨归该学校使用。与此同时，筹建图书馆新馆的工作也正式启动。唐现之日日期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他以一向长远的眼光，最终选定榕湖北路作为新馆址。

1955年2月，榕湖新馆落成，面积为2698平方米，比王城旧馆大一倍，建筑风格为两层廊柱式仿苏联建筑。同时图书馆易名为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桂林图书事业开启了新征程。该馆自1955年从王城迁到榕湖以后，距今已近70年，目前其馆舍仍作为图书馆使用，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陪伴桂林人最久的一座公共图书馆。目前已经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唐现之的“图书馆梦”实现，比他当初预想的十年还要早一点。广西桂林图书馆从王城到榕湖，从旧馆到新馆，从计划到实现，这9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只是刚好走过了一个民国，大步迈进了新中国。

建旧馆时是大家未曾预料到的，王城旧馆的体量无法承载民众的需求是迟早的事情。怎么办呢？唐现之在图书馆复建开放的第二年，就做了一个“图书馆梦”——咱们将来要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图书馆！

那这一座图书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1947年3月15日出版的《广西教育季刊》中，唐现之撰文《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文中他就对自己心中这座未来理想中的图书馆蓝图进行了具体描述如下：

“十年后，本馆馆舍，为钢骨水泥所建造与恢宏壮丽之建筑。其中有：可容藏书百万册之大书库，光空充足之各种阅览室，窗明几净之研究室，可容千人以上之讲演厅——该厅除

用以各种讲演会外，兼供放映电影，表演话剧，举行图展，及座谈会之用。”

如今，当我们走进位于榕湖北路的广西桂林图书馆榕湖分馆馆舍，对照以上唐现之文字所描述的一番景象，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奇妙感受油然而生，而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要知道那可是1947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局依然不明，而唐现之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并坚定地将自己的想法大方公之于众，这不得不令人称奇。对此，以他自己的解释是

“惟本馆同人深信‘理想为事业之母’·‘事在人为’之两大金句”。所以，与其说是未卜先知，不如说是提早计划，努力实现罢了。